

# 黎著「北洋政治：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」

張 朋 園

Andrew Nathan, *Peking Politics 1918-1923:  
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*  
(Berkeley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6)

北洋歷史，在中文的著作中，除了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，更進一步學術性的研究還不多見。坊間有一二類似陶氏史話的史話，幾屬展轉抄襲陶著，不脫殺殺打打的範圍，沒有說出一個道理來，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則可，作為學術著作則不可。何以北洋歷史停留在史話的階段？這與五十年來一個一脈相承的觀念有密切的關係：大家認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，一提起北洋人物，難免想到那一口山東腔的張大帥，這是十分錯誤的，也是歷史學家沒有盡到責任的結果。我們不研究北洋史，西方學者卻搶先了一步，近年這個題目引起了熱烈的討論，可觀的著作相繼推出，這兒所介紹的黎著「北洋政治」便是其中之一。

黎安友（Andrew Nathan）教授，哈佛大學博士，現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。他是一個政治學家，以中國近代政治史作為研究的範圍。在他攻讀學位的過程中，便已發表 *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* (Cambridg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5)，列為哈佛東亞專刊第十七種 (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, 17)。因為這本書的資料豐富，見解深入，前輩學者許其為一顆慧星。本文所討論的北洋政治一書，是黎先生的博士論文，該書自去年出版以來，突破了北洋史的研究，極為學界所重視。

「北洋政治——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」一書，自副標題即可測知著者以「派系」及「憲政」為環扣的概念架構，以民國七年至十二年間的北洋史為討論的中心。中國現代化的演進，技術革新為起點，首先有清末的自強運動（或稱洋務運動）。此一以模仿西方鎗砲鐵甲船為目標的運動，為時三十餘年，然經日本一擊而

化爲烏有。領導階層在檢討之餘，認爲日本有憲法而強，中國無憲法而弱，必須立憲。自戊戌變法（1898）以來，知識分子無不以憲法爲救時的良藥。清末立憲運動不成，民國建立之後繼續爲此一理想而奮鬥。袁世凱的洪憲帝制，張勳的復辟，皆打着君主立憲的招牌。軍閥你爭我奪，亦聲言爲憲政而戰。憲政運動爲中國现代化的第二階段。

但是憲政並不是萬應良藥，國之安定與否，強盛與否，除了政治因素，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均有關係。可巧北洋時期的知識分子，人人服膺憲政觀念，認爲非此不足以救國。然而中國國情與西方不同，西方憲法之成于君主者，在限制貴族的權力，成于貴族（國會）者，在限制君主之權力。西方的政府是以個人（individual）爲基礎的。中國並不重視個人，所以問題重重。而知識分子認爲能知必能行，一定有實行憲政的能力，豈知他們的政治行爲卻是傳統的。他們結爲派系，明爭暗鬥，不休不止。這是黎安友先生的理論重點。黎先生爲什麼又選擇民國七年至十二年作爲討論的範圍？據他的看法，憲政思潮在此一時期最爲濃郁，也是派系鬭爭最爲典型的時期。從民國元年到五年，中國大體上仍是統一的。六年以後國民黨勢力被排斥於北京之外，進步黨旋亦失勢，北洋政權在直皖、安福、交通等派系的把持下，前後十二年間，十易國家元首，四十五個內閣，五個國會，七個憲法，動亂頻仍，表面上有共和之名，骨子裏爲派系之實，連環的戰爭，憲政無從實現。這是近代中國最暗淡的時代。反映派系政治，著者以安福國會（民七至民九）、南北議和（民八）、直皖直奉之戰（民九至民十二），總統位置之爭等作爲討論的內容。

派系政爭與憲政之不果，這兩個主題是有因果關係的，能將派系政治說明，則憲政之失敗不言而喻。因此，著者大部份的功力都表現在派系政治方面。他以三章（九十頁）的篇幅來探討派系的背景與結合，並說明何以北京成爲派系的角力場。第四章至第七章（計一三〇頁）才是史實部份的分析與討論，也可以說是理論的印證部份。結論（四頁）是簡單而扼要的，但說明了派系政治之爲害中國憲政。最後有一個附錄（三十六頁）對八個派系結合的性質加以表解，可以說也是理論的印證。

讀者或許會以爲本書的理論部份過於冗長，史實部份過於簡略。其實這正是本書突出之處，黎博士的深刻觀察與深思熟慮皆於其理論部份得見。以下我要介紹的多偏重於他所建立的理論架構。歷史學家講求史才史德史識，理論架構蓋爲史識的一部份，國內目前之歷史著作於此最爲貧乏。

人類社會皆不免派系之結合。嘗聞：「中國人就會搞派系，派中有系，系中有派」，什麼叫派系？黎教授在第二章中有很詳細的說明。他說，派系就是二人的結合，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連繫。這種二人關係，稱為「護持關係」(Clientist tie)。派系有單一型及複合型，在上者為首領，在下者追隨；在上者保護在下者，在下者服務在上者；採取一致的行動，爭取共同的利益，影響當前的政局。派系之存在，不分中外，然在中國最為發達，何以如此？依照黎先生的看法，這與舊日的「綱常」是有淵源的。中國人一向重視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」的倫常關係，人人謹守，不容逾越。因此在社交場合中，往往先敘關係以決親疏，有關係則格外親熱，無關係則拉關係。「你的上司與我的父親是同學呀！」關係為結合的基礎(頁47-50)。著者歸納中國人所講求的關係為九類：(一)親屬關係；(二)世誼(交)關係；(三)同鄉關係；(四)師生關係；(五)長官部屬關係；(六)同年(學)關係；(七)同僚關係；(八)姻親關係；(九)結拜關係。一至三為歸賦性的關係，四至七為早年建立的關係，八九兩者為結交的關係。這些關係並無等第之分，交相利則親，交相害則疏(頁50-58)。

拉關係是要結合，但結合還得要氣味相投。著者進一步分析民國初年知識分子的型態、社會背景，同時衡量他們對憲政的了解程度。清季新知識興起，科舉制度於1905年廢止，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大部份是半新半舊的。這一批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，入仕則為官僚，不入仕則從事專業(profession)活動，所以民國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羣和逐漸興起的各種法團。著者依照他們的出生的早晚，將之歸納為三類：(1)一八六〇年代出生者，大多有進士功名，同時亦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，他們的傳統觀念很重，並不十分歡迎憲政，但因中國一再敗於列強，人人皆言憲政可以救國，不得不勉強接受。這一代的人物，文人中有梁士詒、張一麐、錢能訓、董康等，武人中有王士珍、王占元、曹錕等，留過學的有段祺瑞、黎元洪、張紹曾、周自齊、唐紹儀等。(2)一八七〇年代者，大多得有舉人功名，所接受的新式教育雖較前代加強了許多，但遲遲轉化，亦屬保守型的人物。此一代的代表者，如朱啓岑、張國淦、王克敏、潘復、張弧等，均有舉人功名，龔心湛、吳佩孚等接受過新式教育，熊希齡是惟一的進士，陳錦濤、曹汝霖、顏惠慶、王揖唐等均曾留學。(3)一八八〇年代者，所受新式教育較前更為加強，傳統教育大為減弱，留學資格尤為突出。他們有個人主義，自由平等的觀念，反抗意識強烈，他們是五四運動時期的領袖。入官僚系統的人物，受前代的庇護，觀念並不激烈，但他們強調共和政治。代表人物如葉恭綽、李思浩等受過本國的新式教育，徐樹錚、黃郛、錢永銘、顧維鈞、羅文幹等均曾留學。(頁7-25)

派系的成因如此。何謂派系政治？根據黎教授的看法，這是一種非正式的政治軌道（頁 2），以秘密活動、散布謠言、賄賂、欺騙、暗殺等手段以達成一派一系之權勢（頁 221-224）；在官場中爭取部會的控制，在國會中則爭取票源，在軍中爭取軍隊的控制，在金融界則控制銀行系統，在地方則左右地方發展。派系政治有下列種種特色：(一)文明的鬭爭，各人爲各人的首領效忠，立場分明，但因敵我朝夕相見，都是面對面的，必須表面上很有禮貌，鞠躬打拱，客客氣氣，決不口出惡言；(二)目的在打倒別的派系，如果無足夠的力量推倒對方，則防止對方強大，保護自己不倒；(三)攻擊對方，要秘密進行，乘人之危，一舉而下；(四)攻擊與防衛，要聯合友系，但因利害難於一致，聯合對象常常改變，故派系合離無常；(五)派系利益不違反國家利益，但意識型態則有出入；(六)派系內部一致則有所抉擇，否則即發生分裂；有分裂則有政治危機，有危機則有新的結合，新的循環開始；(七)派系亦講求意識型態，但芝麻大的問題就可以引起分歧，因此派系政治是見小不見大的，難於有所作爲。（頁37-43）

民初的派系，根據黎教授的歸納，重要者有四類八派系：(一)軍人類——直系；(二)官僚類——新舊交通系；(三)個人類——皖系、安福系；(四)政客類——研究系、政學系、益友社。（頁 225）這八大派系，或導源於清末的維新派與革命派，或與新式的軍系、新興的法團有關，或爲地方勢力的結合。（頁 44-47）他們的種種鬭爭，著者在討論安福國會與徐世昌的黑馬總統（第四章）、南北議和與直皖戰爭（第五章）、法統恢復與黎元洪之三度上臺與下臺，好人內閣（第六章）、曹錕賄選（第七章）等事件有很生動的分析與敘述。以安福國會的選舉爲例，這是一個以賄選產生的國會。安福俱樂部投入大量的金錢，十七省參加選舉，十一省爲其控制，加上邊疆議員及中央學會議員亦由其一手包辦，四八二名議員，屬安福系者三四三人，控有絕對多數。（頁 102-105）段祺瑞爲安福首領，其有意總統，呼之欲出，何以又落到徐世昌這匹黑馬身上，這是段祺瑞與馮國璋鬭爭的結果。（頁113-118）南北議和，人人翹首以望，何以議而不和，其錯綜複雜，最明顯的是安福國會議員、舊國會議員，民八份子等所謂民意代表得不到適當的出路。（頁150-158）直皖之戰是一個典型的派系戰爭，（頁 163-175）黎元洪三度登臺謂爲法統恢復，實際上不過是直系在爲自己鋪路。好人內閣十二天而夭折，是因爲他們沒有拉派系關係。（頁 176-200）曹錕以五千元一票的價格買得了總統，中國人奮鬥二十餘年的憲政至此幻滅（頁 201-220）。

以上大致是本書的內容。黎先生以其政治學家的素養，歷史學家的態度，有理

論，有證據，歸納演繹，剖析入微，娓娓道來，非常引人入勝。著者在書中又提出了一些我們所不太留意的問題，其答案洞若觀火，很有深度，茲舉數則如下：

常聞「北派政府令不出城門」，此言雖不無過分誇張之處，卻說明了北京政府沒有實際的力量。然何以軍閥人人垂涎北京而必欲得之？黎先生的答案說：當時的北京有奇貨可居的價值。第一，取得北京者，在心理上即以為取得了合法地位。當時無人不要求統一，控有北京即以為已經統一，雖然其反對者高唱獨立，他是充耳不聞的。其次，北京久為中央政府所在，地方軍閥之尋求北京任命者，大有人在，有北京的任命，亦取得了合法的地位，否則他人即可假討伐盜匪之名而討伐之。因此北京在一定的限度下，還有相當的尊嚴，受到尊重。再其次，北京得到列強的承認，列強聲言只承認一個中國政府，指的是北京政府，無論訂條約，借外債，列強只以北京政府為對手。列強的姿態旨在確保其在華利益，何況列強使館皆在北京，為保駐節使領安全，拳亂之後，明訂條約，不得在北京進行戰爭。最重要者，洋員控制下的海關只對北京負責，海關關稅雖已大部抵押，北京尚可獲得少許關餘。海關只對北京解款，他人不得動用。鹽稅與關稅情況相同，善後借款抵押之後，間接亦受列強控制，惟有北京政府為其交涉對象。凡此無異承認北京的合法性，自然阻止了各地軍閥之自立為魁。（頁 59-64）這是黎博士對北京政權的解釋，甚有所見。

對於新式銀行影響北京政局，黎博士也有相當精到的看法。一般皆謂交通系控制新式銀行，所以能左右政局。然何以控制銀行就能發生影響。這並不是因為銀行擁有足夠的財力而左右之。相反的，這是各銀行資金不足，組織甚不健全的關係。民國建元以後，北京財政，除了袁世凱時期尚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外，無時不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下。入不敷出的原因，第一，地方截住各種稅收，中央得不到地方的解款，欲炊無米，只有借外債一途。然北京政局不穩，海關鹽稅均已抵押，列強拒絕借款。無法，惟有舉辦內國公債。袁氏死後，政府信用低落，內債不得以銀行為對象，因此銀行與政府的財政發生了關係。中國的銀行，民國初年有一百十九家之多，然此百餘家銀行的資本總額，尚不及在華二十七家外國銀行資金之四分之一。且外國銀行在華有貨幣發行權，控制了通商口岸的金融。另一方面，當時的傳統錢莊仍然擁有相當勢力。各錢莊資金雖小，合起來仍大過於中國之新式銀行。他們經營不同錢幣的兌換，觀風轉舵，小額借貸，頗有盈餘，新式銀行亦不得不向其周轉。如此一來，新式銀行夾在外國銀行與錢莊之間，無法競爭，只有高利吸收存款以維持所發行紙幣的信用。高利抵付，只有作投機的金融活動，因此競向政府爭

取債券發行權，以自己發行的鈔票買進政府的公債。這種作法是要擔風險的。如果政府無力償付債款，銀行即面臨倒閉的危機。爲了安全起見，當然進而左右政府。內閣的去留受銀行的影響，關鍵便就在於此。（頁 64-90）銀行影響政治，確實是銀行不健全的關係，黎教授的看法是一針見血的。（參看本刊另一書評）

本書獨到的論證尚多，在此不必一一列舉。當然，全書並非沒有值得商榷之處。例如黎先生論北洋的派系鬭爭，指出派系政治限於高層官僚，基層人員鮮有因主管之去職而受影響者。因此所得結論，北洋的官僚系統相當穩定，其穩定比之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（頁 69-74）穩定的官僚政治應該是進步的，法國革命以來，共和與帝制起伏不定，全靠穩定的官僚系統維繫。中國的官僚系統一向也受到推崇。然則北洋時期的官僚系統能否與法國者相提並論？設若北洋官僚系統不受派系政治影響，應該有其進步的一面。試問北洋時期有什麼值得稱道？這一點黎先生沒有進一步說明。

著者謂派系政治崇尚謠言、欺騙、賄賂、暗殺，（頁 221-224）我同意前三者，保留最後一點。我個人的了解，北洋暗殺事件比之其他時代並不算多。誠如黎教授所說，派系鬭爭是一種文鬭而非武鬭，段祺瑞、徐世昌、黎元洪等下臺之後，均能安全離去。用這一觀念來反證暗殺手段之不成立，不知以爲然否。

最後，我要提一提史料問題。北洋時期的史料缺乏系統性整理，因此研究者往往捉襟見肘，感到困難重重，這或許是北洋史不能普遍吸引研究興趣的原因之一。但黎教授克服了此一困難。他閱讀的範圍很廣，尤其使用當時的報紙雜誌、領事報告等最爲詳盡，他重建史實的工夫是令人佩服的。當然他並沒有克服所有的困難，例如附錄中所繪製的派系人物關係圖，由於史料的殘缺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不容易完全弄明白的。這一點我們不能苛責他，實在是沒有資料可資參考的關係。但著者在討論安福國會的選舉時，不知爲什麼沒有引用「徐樹錚電稿」，該書有一些材料可以進一步印證派系之爭。

以上所舉各點，多屬見仁見智的問題，不過提出來與黎教授商榷。我必須告訴這篇書評的讀者，北洋政治一書，雖非十全十美，確是一本力作。黎教授的文筆輕快簡潔，可讀性極高，凡對北洋史有興趣者，不可不讀。